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評介Warwick Anderson《失落靈魂的收集者》

A Review of Warwick Anderson's the Collectors of Lost Souls: Turning Kuru Scientists into Whitemen

doi:10.6752/JCS.201006_(11).0016

文化研究, (11),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2010

作者/Author : 李尚仁(Shang-Jen Li)

頁數/Page : 250-25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1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1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書評

《文化研究》第十一期（2010年秋季）：250-254

評介 Warwick Anderson 《失落靈魂的收集者》

A Review of Warwick Anderson's *The Collectors of Lost Souls: Turning Kuru Scientists into Whitemen*

ISBN-13:978-0-8018-9040-6, 318 pp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李尚仁

Shang-Jen Li

本書主題是庫魯(Kuru)研究的歷史。此一疾病盛行於新幾內亞(New Guinea)偏遠高地的佛瑞人(Fore)，受害者顫抖、肌肉無力，接著甚至四肢失調、失禁、無法言語，最終死亡。佛瑞人認為這是種害人的巫術所致，稱之為庫魯，今日科學家則認為庫魯和庫賈氏症(Creutzfeldt-Jakob Disease，簡稱CJD)及狂牛症(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簡稱BSE)一樣，都是由普立昂(prion)蛋白所導致的慢性神經退化疾病。¹從1940年代與1950年代庫魯發現以來，醫學界乃至人類學者對其病因提出不少假說與解釋，包括原始部落接觸文明後所產生的精神病、腦膜炎後遺症、飲食缺乏某種營養、環境毒素、遺傳疾病等等。透過探討分析庫魯的疾病研究史，安德生(Warwick Anderson)企圖側寫20世紀下半生物醫學史的風貌。

本書描述討論到的人物衆多，但全書主要敘述與架構其實都環繞著確認庫魯是種傳染病，並提出「慢病毒」(slow virus)感染的說法，於1976年獲頒諾貝爾獎的美國醫師蓋杜謝克(Daniel Carleton Gajdusek,

1 關於普立昂蛋白與狂牛病簡短易讀的研究回顧，參見陳佩燁，〈因瞭解而不再有無謂的恐慌：漫談狂牛症〉，《中央研究院週報》1304期(2011/01/06)：5-7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49/4971.pdf>)。

1923-2008)：這位在給實驗室僚屬的指示中會引用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與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詩句並夾雜對達達(Dada)的討論、性格狂野不羈的醫師，是醫學史罕見的精彩人物。安德生數次將他比擬為康拉德(Joseph Conrad)筆下的吉姆爺(Lord Jim)。蓋杜謝克出身紐約的匈牙利移民家庭，自幼母親就費心讓他浸淫在歐陸文化傳統，從小就帶他閱讀古希臘羅馬經典，並培養他對德國作曲家與作家的品味。蓋杜謝克對文學與歐陸哲學興趣濃厚，卻選擇科學作為志業，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學學位，隨後到加州理工學院從事當時最熱門的噬菌體研究工作。蓋杜謝克並非一般的科學家，他精力充沛、睡眠很少。白天通常在宿舍閱讀卡謬(Albert Camus)、卡夫卡(Franz Kafka)、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等現代作家的作品，天黑才進實驗室工作。週末從事登山健行，在荒野中一待數天。

和實驗室研究相較之下，田野研究更讓蓋杜謝克著迷。在前往新幾內亞之前，他已經在伊朗(Iran)與阿富汗(Afghanistan)邊境以及亞馬遜(Amazon)地區進行疾病調查研究。來到新幾內亞，除了庫魯之謎引起他研究興趣之外，需要長途跋涉艱苦登山才能抵達的佛瑞人聚落，其地理環境和當地文化風俗也讓蓋杜謝克著迷。研究庫魯需要大量實驗室工作，蓋杜謝克是美國國家衛生院的實驗室主持人，然而，他並不喜歡實驗室的常規、紀律和現代科學的科層組織。蓋杜謝克透過對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道德系譜學》(*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的閱讀，在日記中對於現代科學建制的特性有尖銳深刻的反思。安德生則透過蓋杜謝克的例子，對田野科學(field sciences)與實驗室科學(lab sciences)的關係與張力做出精彩的探討。

殖民官員認為新幾內亞土著經常械鬥衝突，但頂尖科學家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蓋杜謝克的庫魯研究使得他和澳洲醫學研究菁英關係極度緊張，後者屢次試圖阻撓他的研究。安德生將這些衝突放在二次大戰後西方科學型態演變的大脈絡下考察：美國大型科學興起，醫學研究的觸手開始做全球性的探索，進而和澳洲科學界的民族主義產生嚴重的衝撞。此外，蓋杜謝克不羈的個性與特殊的行事作風，也使得曾和他共事、交往或交手的科學家與澳洲官員，不是對他產生強烈

反感就是與他建立起堅強友誼。例如，在1960年代獲得諾貝爾獎的澳洲醫師柏內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是20世紀生物醫學整體論(holism)的代表人物，對免疫學與疾病生態學有重大原創貢獻。蓋杜謝克認同柏內特的觀點和研究方向，卻和對方相處不來。他認為「麥克爵士」(Sir Mac)威權專斷、不容下屬與後輩出頭。柏內特則嫌惡蓋杜謝克缺乏定性：「你永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突然消失一星期去研究黑格爾(G.W.F. Hegel)，或是一個月不見跑去和赫比族印地安人(Hopi Indians)工作。」(39)其實這段期間蓋杜謝克是投入了俄文的學習。前往新幾內亞前夕，他正在閱讀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俄文原文小說《死靈魂》(*Dead Souls*)。這也是本書書名的典故。

本書對這些衝突摩擦的詳盡記述，其旨趣並不在於爆料、揭露學界秘辛，而是要探討科學研究的「經濟」(economy)。此種經濟並非目前經濟學所討論科學研究的利潤、報償、附加價值等課題，而是道德科學所探討的廣義經濟。這是本以交換(exchange)為研究主題的科學史著作，探討科學交換網絡的建構與運作，以及交換過程中價值、物的性質與人的身分(identities)轉變。蓋杜謝克及其同儕在當地與佛瑞人長期互動，除了提供醫療服務外，還致贈毯子、大米與魚罐頭給對方。佛瑞人則回贈蔬菜與豬肉。科學家雇用當地年輕人當助手，參與當地人的儀式、貢獻新娘禮物(bride gift)，和當地人建立類似親屬般的關係，在庫魯病人瀕死時與家屬展開協商，贈送禮物以取得對方允許進行解剖和摘取器官。以贈品換取檢體的作法今天常常受到醫學倫理學者的嚴厲批評。他們認為這樣的贈品利益會影響受試者的判斷，違反嚴謹的知情同意原則(informed consent)。然而，這種倫理學觀點並無法理解蓋杜謝克和佛瑞人的交換關係。相較於今日走向私有化的科學研究，這種交換屬於完全不同的道德經濟。相對地，安德生的研究指出，那些只在當地部落作短暫停留，並試圖用金錢直接購買解剖佛瑞人遺體權力的科學家，等於是進行毫無節制之消費的「醫學食人主義」(medical cannibalism，這是蓋杜謝克自己的用語)，其行為每每造成難以控制的道德風險和混亂。

蓋杜謝克在現代科學社群中也進行細膩、複雜的交換，以標

本、設備、協助、研究線索與資訊進行複雜程度不遜於美拉尼西亞(Melanesia)部落風俗的禮物交換。庫魯病人的腦標本這項「科學物」(scientific thing)就是他進行交換、建立關係最主要的「禮物」。即使同僚認為現有標本已經遠超過研究所需，蓋杜謝克仍近乎執迷地不斷要求他們取得更多佛瑞人的腦標本，這種取得的慾望正源自此種交換經濟。蓋杜謝克是此種交換政治的高手，並因此而成爲科學家部落中的「大人物」(big man)。蓋杜謝克同時在佛瑞人與現代科學界這兩個領域進行交換，安德生指出，實驗室是他之所以能穿梭這兩種交換體制的關鍵：佛瑞人遺體在實驗室內去人格化、被從原本的人際交換網絡中抽取出來，成爲「科學物」進入另一個交換體制。安德生認爲蓋杜謝克在實驗室所達成的，就類似佛瑞人在船貨崇拜(cargo cult)時所進行的巫術，其角色就如同法力強大的科學巫師。

《失落靈魂的收集者》是本醫學史著作，卻和人類學有密切關係。首先，許多人類學者在庫魯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人類學者最早對庫魯提出身心症的病因解釋，也最早對食人習俗與此一疾病關係作出系統研究。米德的前夫福騰(Reo Fortune)、澳洲人類學前輩艾金(A. P. Elkin)與納達(S. F. Nadel)、柏恩德夫婦(Ronald and Catherine Berndt)、日後在醫學人類學領域赫赫有名的馮珠娣(Judith Farquhar)與琳燈葆(Shirley Lindenbaum)都是故事中的角色。其次，蓋杜謝克的研究興趣也涉及了人類學課題。年輕時就對兒童問題與福祉極爲關心的蓋杜謝克，來到新幾內亞的主要初衷，是研究當地兒童發育問題。對土著兒童的著迷也導致蓋杜謝克晚年的悲劇。最後也重要的是，本書以人類學的理論概念來分析科學社群，透過對交換關係的研究，安德生宣稱本書的旨趣在於「揭露現代科學的原始基礎」(2)。

蓋杜謝克成功的模式並無法持久。一方面，佛瑞人原本認爲白人抽血和摘取死者器官，是要以其強大巫術將這些身體部位作成對抗庫魯巫術的解藥。不可避免地，時間一久他們因失望而日益不耐不滿。金錢經濟的引進，也使佛瑞人的交換行爲與價值觀產生轉變。另一方面，受澳洲白人社會影響日深、越來越乾淨整潔的佛瑞地區，則讓蓋杜謝克逐漸失去興趣。此外，1980年代末生物醫學研究開始出現重大

轉變。安德生以發現普立昂蛋白而贏得諾貝爾獎的史坦利·普魯希納(Stanley Prusiner)作為這種轉變的代表。普魯希納的科學生涯正好碰上加州灣區生技產業起飛的時代。他專注實驗室研究、申請專利、開設生技公司研發與銷售普立昂疾病的診斷工具，在市場化的學術環境如魚得水、名利雙收。蓋杜謝克瞧不起這種「狹隘」的生物化學研究取向，但他逐漸成為一名「過氣」人物。他建立在禮物關係上的科學實作方式，和醫學研究私有化、商品化的潮流格格不入。他無法適應現今科學研究的市場經濟，他的「慢病毒」則受到普立昂蛋白嚴重的挑戰。

近年來見解深刻、開拓創新議題的科學史與醫學史著作多有所在，但在學院寫作格式限制下，寫作風格精彩、敘述方式吸引人的作品則不多；本書正是這樣的少數傑作。安德生以細描的文筆，讓書中人物的性格與情志躍然紙上，使讀者難以把書放下。在狂牛症爭議尚未止歇的此時，閱《失落靈魂的收集者》會聯想到許多當下的議題；然而，如果我們只把這本書當作狂牛病的前史或是庫賈氏症的發現史來閱讀，那就看窄了這本內容豐富的精彩著作。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本書是對20世紀生物醫學物質文化的深入探討。它也是安德森近年來大力鼓吹「後殖民醫學史」研究的絕佳範例。